



黑龙江历史文化研究工程项目 (03Z D1502)

(第二卷)

李兴盛◎主编

李興盛文集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黑龙江历史文化研究工程项目 (03Z D1502)

李兴盛文集

(第一卷)

李兴盛◎主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兴盛文集 / 李兴盛主编. -- 哈尔滨 :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207-11032-9

I. ①李… II. ①李… III. ①李兴盛一文集②黑龙江省—地方史—文集 IV. ①K293.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24791 号

责任编辑:朱佳新

书名题字:张本义

封面设计:鲲鹏

排版设计:品味书香图文制版工作室

李兴盛文集

Li Xingsheng Wenji

李兴盛 主编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邮 编 150008

电子邮箱 hljrmcbs@yeah.net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印 刷 黑龙江艺德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240

字 数 3 800 千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7-11032-9

定 价 780.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刷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我的治学与感恩

——《李兴盛文集》序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屈原《离骚》

在垂暮之年，自己的治学即将画上句号之际，乘着本《文集》的出版，不能不将本人 57 年（以 1961 年为始）来单枪匹马、孤军奋战在荆棘丛生的治学征途上坎坷不平的历程做一番总结。

本人在贫穷而苦涩的少年时代就酷爱读书，由于最初接触的著述均为文学作品，因此培养了我对文学的浓厚兴趣。至 1959 年，由于受到柳亚子、谢国桢先生的影响，转向为南明史之爱好与研究。1963 年又由于黑龙江大学历史系段景轩先生影响，研究过中国（尤其是明末）农民战争史。基于此，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就开始写旧体诗（后辑为《雪鸿诗草》），并写有以民族英雄郑成功、李定国、张煌言抗清事迹为题材的电影文学剧本《海上风云》《烽火忠魂》《怒海风涛》及话剧剧本《郑成功》。还于 1959 年开始收集《痛史》《荆驼逸史》丛书等南明史料。1960 年，据这些史料考证了南明唐王与鲁王先后争立的史实写呈谢国桢先生求正。1961 年冬写了本人严格意义上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李定国纪年〉质疑》。后来，陆续编纂了《李锦李来亨纪事编年》《李锦李来亨传》《南明抗清志士绝命诗词选（附小传）》（又名《南明碧血录》）三书及一些论述农民战争史的论文。这些论文投寄给许多报刊，均石沉大海，可是 1965 年却得到了《光明日报》学术部的关注与支持，他们于 6 月 18 日写信要我一份拙稿中关于农民平等平均思想部分单独改写成专文，准备采用。12 月上旬与下旬又分三次寄来多份“撰稿参考选题”，我在兴奋之余，按照他们所拟的题目又写了一两篇论文寄去。可是 1966 年春夏之交，风云突变，“文化大革命”即将爆发，国内的政治形势已不允许学术

刊物的存在,因此该社将拙稿寄回,告知本人所撰稿件,“本拟备用,但根据目前情况……已难安排刊用,特奉还”。拙稿《光明日报》准备刊发而未果,幸耶,不幸耶?至今思之,若没有“文革”,或“文革”晚发生几年,拙稿当时刊发在《光明日报》学术版自然是极为荣耀之幸事,但刊发之后,在“文革”中会不会遭到红卫兵以宣扬“封资修”罪名的批判呢?现在看来,实恐难免。基于此,当时未刊,却成为一件幸事。

从1966年夏秋之交“文革”始,我在大学中无所事事地度过了两年(仅在偏僻的校园角落里偷偷读过书,用划钢板的方式油印过自己编选的《历代诗选》),在农场锻炼过一年多,在中学(位于郊区)工作八年多,至“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冬,经哈尔滨师院(今哈师大)历史系周齐先生推荐,调到黑龙江省社科院历史所工作。这期间,于“文革”最后一年(即1976年),有两篇论文分别在《黑龙江大学学报》《哈尔滨师范学院学报》发表,从此正式开启了我的学术论文发表之路。

调入省社科院后,从事与以黑龙江地方史为主的东北历史文化研究。但不久发现东北史这一研究领域的方方面面基本已被前人及当代学者所垦辟与耕耘,想要有大的突破与大的创新已经很难很难,因此产生了“做学问应该走一条自己的研究之路,即独辟蹊径、独树一帜”(这也是我治学座右铭)而不应总是跟在别人之后人云亦云、亦步亦趋的想法。

先是,1963年读过清初著名词人顾贞观以词代书写给远戍宁古塔的友人吴兆骞的两首千古绝唱——《金缕曲》词,对吴氏之绝世才华、悲惨遭遇及其与顾氏生死不渝的友谊,深为感动,从而引发了我对东北流人的关注。入社科院后,在通读《明实录》《清实录》时,对东北流人数量之众多,又深感震惊。更为重要的是,这时还读了谢国桢先生《清初流人开发东北史》一书,从而使我产生了研究与弘扬东北流人艰苦奋斗、艰难创业的精神及其光辉业绩的心愿。1980年夏,我去北京收集史料时,曾多次拜谒谢老,谢老对我的这种想法与心愿给予了充分肯定与大力支持。同年冬,《学习与探索》刊发了我不成熟的第一篇流人问题研究之作《清初流人及其对黑龙江地区开发的贡献》。可见,1980年秋,正式确立了我对与我国边疆史既有区别,又有血肉联系的流人问题研究的主攻方向。

流人,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群体,与我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相始终,历史悠久,数量众多,且名人辈出。其中不乏许多著名的文人、学者、艺术家、政治家,乃至林则徐等民族英雄。流人中固多实系犯罪之人,但

被统治者诬以各种罪名而负屈远戍的无辜者也不在少数。他们流放之地,固然全国各地均有,但主要是荒寒僻远或蛮烟瘴雨的边塞地区。他们到边疆后,为边疆土地的开发、城镇的形成、经济的繁荣、文化的发展,乃至边疆的戍守与保卫、民族的融合与团结,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尤其是其中无辜人士那种艰苦奋斗、艰难创业的精神及其光辉业绩,以及在逆境中成才的感人事迹,是值得弘扬与研究的。

为此,三十七八年来,在谢国桢先生及此后依次为我赐序的罗继祖、钱仲联、来新夏三位先生大力支持下,我对我国历代流人这种特殊的社会群体与社会现象做了全方位、多层次、系统化、理论化的深入研究与完整论述,并首次向我国学术界提出了经本人进行理论探讨与诠释过的流人文化这一新的名称、概念与命题;出版了我国第一部流人通史之作《中国流人史》、第一部区域性流人通史《东北流人史》(此二书均有增订版)、第一部流人问题理论探讨之作《中国流人史与流人文化概论》(作为上编,收入《中国流人史与流人文化论集》之中);编纂并出版了我国第一部流人历史文化丛书《东北流人文库》(虽因故仅出版了11册,与原规划距离过远,但这毕竟是目前同类丛书中的第一部)。近年来,又在来先生大力支持下,为流人学这种新的研究体系的创建奔走呼号,惨淡经营,从而结束了我国流人问题研究没有通史之作、没有理论支撑、没有丛书出版、没有形成体系的局面。

在以绝大部分精力、心血与时间研究流人问题的同时,还曾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领导大力支持下,于20世纪90年代初至2014年,策划、编纂并陆续出版了大型黑龙江地方文献丛书《黑水丛书》14辑,每辑数十万至一百六七十万字不等,总计一千六七百万字,收录文献140余种。该丛书自第5辑始,本人实际上已任第一主编,前几辑也曾参与整理。出版经费由省出版局以评为精品图书的名目予以提供(出版社也提供一些),而文献之搜集与研究经费只靠微薄的稿费维持,编辑之窘况与困境可想而知,它此后的命运也就不言而喻了。

总之,自1961年撰写第一篇学术论文开始,至今撰写与发表的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三四十篇,其他各种类型文章百数十篇。这样,迄今为止,本人已出版之专著及任主编、第一主编(含执行主编)之各种类型著述47部,任副主编者4部,计51部,加上各种类型文稿,总字数已远逾二千万字。《李兴盛文集》正是这些论著及少部分未刊论著的选编。

也就是说,本《文集》系从这些已出版、刊发及少部分已写未刊发的论著中,选取本人独自撰写的书稿或文章编辑而成。地方文献与流人文献整理之类著述虽不收录,但每种文献整理之前言、后记、序跋、题记等除外。本人独自撰写的各类书稿与文章 700 余万字,这次选编 320 万字左右。此外,还将历年各界评介本人或本人著述之文章选取近 60 万字,命名为《品读李兴盛》附于本《文集》之后。这样,全书计为 380 余万字。

这次选编,仅《中国流人史》(初版与增订版)《东北流人史》(初版与增订版)《吴兆骞年谱》(初版与增订版)《历代东北流人诗词选注》《边塞诗人吴兆骞》五部书稿,350 余万字,或因有单行本发行,或因列入《东北流人文库》已于近年出版,故不再收录。本人其他书稿,《江南才子塞北名人吴兆骞传》《黑龙江汉族文化》《黑龙江名人(一)》《黑龙江历代诗词选注》《黑龙江历代旅游诗选(含注)》《中国流人史与流人文化概论》六部书稿系整体收录,其他书稿均打乱顺序,与各类文章混在一起,重新分类编排。

本《文集》320 万字左右,加上未曾收录的《中国流人史》等五部书稿 350 余万字,已达 670 余万字。在这 670 余万字书稿与文章中,倾注我心血、精力与时间最多之作,也就是我最为认可之作为《中国流人史》《东北流人史》《中国流人史与流人文化概论》以及《诗人吴兆骞系列》。按此《诗人吴兆骞系列》系由《江南才子塞北名人吴兆骞传》《江南才子塞北名人吴兆骞年谱》《江南才子塞北名人吴兆骞资料汇编》(增订版改称《吴兆骞研究资料汇编》)三部书稿组成,已于 2000 年出版。惜《吴兆骞资料汇编》为史料汇编之作,《吴兆骞年谱》增订本虽为编著但因已收录《东北流人文库》并于近年再版,均不在本《文集》收录范围之内,所以导致该《系列》三部书稿萍踪浪迹,不能合而为一,不能不略感遗憾。特此说明。

综观自己治学五十七年来,所发表或出版的论著数量能达到这种规模,而且所研究的课题也已产生一定的社会反响,这是聊以自慰的。这种影响的反映是多方面的,除了本人所获得的各种奖项及荣誉外,还有许多专家学者所写的评介本人或本人论著的文章(如序言、书评、评语、传记等),媒体的采访与报告,以及许多读者写给我的书信,这些文稿我已选编为《品读李兴盛》一书,作为第六卷收入本《文集》之中。又如在参加学术会议时,某些素昧平生的学者的讲话也有评介本人之处。此外,为编辑本《文集》上网查寻相关资料时,又发现许多网友的评述。下面就后二者举几个典型事例以表达本人的谢意。

2008年冬,黑龙江省文史馆领导责成我筹编《中国地域文化通览·黑龙江卷》,次年4月17日,在中央文史馆召开的《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各卷提纲编写汇报会上,我介绍黑龙江卷,拟突出渤海文化及流人文化等五种历史文化时,《通览》编委、中央民族大学王尧教授发言称流人文化为“光芒四射”。王先生平时仅知其为著名藏学家,并无只字交往,不料对流人文化竟然给予这样高的评价,使我非常感动。

1997年4月,我赴香港参加珠海书院举办的一次学术研讨会,台湾地区政治大学胡春惠教授在自由发言中,对本人为大会提交的流人文化论文评价是:“他这篇文章所表现的、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充满了令人感动的一篇好文章。在他的文章的字里行间,几乎每一句话都闪耀着触人心弦的音符,因而使得我有了一种想要发表意见的欲望……”

打开网络,如果点击“流人”“流人史”“流人文化”“李兴盛”诸词,还可以查到许多网友对本人或本人著述的评述。网上有刘建平先生《清代罪犯递配制度研究》一文,内谓:“李兴盛在上世纪80到90年代致力于提倡对清代边疆流人之研究,之后有一大批学者投入流人史的研究。”刘先生对本人的流人研究为后来“大批学者投入流人史的研究”起了引领作用,做了肯定。

在“天涯论坛”有署名德赛斋主人之《述古书坊淘书记》一文,列书18种,第7种为拙著《中国流人史》,其评述如下:“厚达1160页,字数110万,视角独特,资料贻备。”

另有署名“东方樵夫”的博客,谓拙著《中国流人史》“集中研究了中国流人……皇皇巨著,独树一帜……1998年初冬,在北京的五四书店,见书名,一奇,流人史?前此未见……我果断买下它的原因,是因为书中的一句话:天下才子半流人”,并据拙著写了《才子流人》14篇博文。

当220万字的拙著《中国流人史》增订本出版后,当当网网友有7人购买后,均给予好评,其中一位网友谓:“价格不菲,物有所值,不错的学术著作。”其中“价格不菲”是指本书很贵(定价为386元),“物有所值”二语自然是从内容上肯定本书的学术价值。

新浪博客有“张建林博客”,内有《吴兆騫家书》一文,谓:“李兴盛先生从事流人学研究,并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对中国流寓文化的研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这一独特的研究领域里,将他称为‘中国流人文化第一人’,应该是当之无愧的。”

新浪博客另有剑锋冷然的博文,内有《顾贞观致吴兆骞书与吴兆骞致纳兰容若书》一文(按此文新浪博客“望云轩的博客”也曾全文转载),其中所录顾、吴书信均据本人主编之《黑水丛书》第6辑《秋笈餘韵(外十八种)》,而且谓:“(《秋笈集》与《归来草堂尺牍》)此两书经东北地方史专家李兴盛先生收集整理,考证校订,编入了《黑水丛书》中,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渐为学人所知和利用,李先生有文献开发之功,功莫大焉!”此外,“豆瓣读书”有苏野先生《吴兆骞:被遮蔽的痛苦》一文谓:“此文的撰写受惠于吴兆骞研究专家李兴盛教授著作……甚多,谨向李兴盛教授致敬。”此类文章,不再一一列举。

另外,我的大学同学康有山先生在读了我的大部分论著后,曾写有评介本人的《学者的风范 专家的脚步——记当代流人史专家李兴盛先生》一文,于2011年发在网上,至今点击率散文网为3357人次,江山文学网为3171人次,其他网转载者很多(有的网友还曾为我“点赞”)。本人的事迹经康先生撰文发到网上,竟然有数千人关注,实在出于我意料之外。

音乐家重视的是《高山流水》,能遇知音;一般人士重视的是相处融洽,能逢知心;而一个学者所企盼的是承载其研究成果的作品(论著)能获知己。目前,许多评介或关注我的专家学者及读者(包括网友),可称是我的知己。如果一个学者所撰写与出版的论著,无人问津,只能束之高阁,这是很可悲之事。因此我看了这些素不相识的专家、学者与网友的评语与关注,非常感动,也万分感谢!这种发自内心的感动与感谢,不是语言所能表达的。因为这些客观的评价,既是对我数十年如一日的科研工作及科研成果的肯定与认同,也是对我的巨大鼓舞与鞭策,使我在科研道路上向新的高峰攀登。在这里,我对关注及支持我的所有的广大读者与网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上述引文证实了本人的流人研究在社会上确实产生了一定的反响。尤其是反观我国流人问题研究的现状,与“文革”前备受学术界冷遇的局面相比,就论著数量与研究人员之激增,研究深度与广度之加大等来看,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与本人于1980年正式确立流人问题研究时相比,也是不可同日而语,大为改观。其原因固然主要取决于打倒“四人帮”后,“海宇廓清,学术文化顿显新颜”(来新夏先生语),但客观地讲,与本人三十八年来为此始终不渝地奔走呼号、惨淡经营,且身体力行不无关系。也就是说本人在这一转变中起了引领或推动作用。看到

流人史、流人文化,乃至流人学这一新的研究领域的开拓与新的研究体系的真正创建成功为期匪遥,可以告慰于谢国桢及罗继祖、钱仲联、来新夏四位先生在天之灵,心中的喜悦是无可言喻的。

总之,本人数十年来的学术研究虽不能说是功成名就,但可说是论著丰产,事业有所成就。其原因何在呢?我想,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得益于祖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得益于本人早年苦难与贫困逆境的磨砺,得益于家庭与社会各界乃至广大读者的大力支持与关爱。

一、传统文化的教育

我自1959年开始搜集南明文献,1960年考证南明鲁王与唐王争立先后之史实,写呈谢国桢先生求教,1961年冬写有严格意义上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可见仅仅治学的历程迄今已近六十年。如果自1959年逆推至1950年本人上小学四年级始阅读演义小说时,至今已六十七八年。在这漫长的人生岁月中,我所受的教育主要是我国的民族文化,尤其是其中的传统文化。祖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令人高山仰止,也令我情有独钟,从而培养了我对传统文化的深厚感情。如我对古典诗词不仅酷爱,自上中学时试写,迄今未辍。而且对于古琴、箫、笛、二胡、江南丝竹等民族器乐演奏的古典名曲,如《春江花月夜》《高山流水》《月儿高》《二泉映月》《钗头凤》《葬花吟》《良宵》《月夜》《平沙落雁》等国乐同样情有独钟,往往沉浸在古典诗词、国乐的意境中,伴随着诗词抒发的感情与乐曲表达的旋律而如醉如痴,不能自己。正是这种深厚感情,才使我产生了钻研学术及为祖国学术事业献身的精神。尽管学术研究,尤其是其中的文史研究因无经济效益可言,研究者要终身清贫,但是我却初心不改,始终如一,在这条道路上拼搏了数十年,无怨无悔。由于对传统文化情有独钟,且精诚贯之,而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再加上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及承载这种文化的载体——我国古籍的浩如烟海,为本人的文史研究开拓了广阔的空间,并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大量史料。基于此,事业会有所成就,论著也会丰产,也就不足为奇了。可见,传统文化教育奠定了本人学术研究的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传统文化也培养了我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并由此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与自尊心。基于此,我崇拜苏武、岳飞、文天祥、夏完淳、张煌言、郑成功、李定国、李来亨等民族英雄。他们那种崇高的民族气节与爱国精神,那种杀身成仁与视死如归的英雄事迹,甚至与他们有关的

诗词乐曲,如《满江红》《正气歌》《苏武牧羊》等,都曾深深震撼着我的心灵,令我扼腕慨叹,唏嘘不已。而在外侮严重的情况下,对祖国与民族处于苦难时期的耻辱也痛心不已。尤其我在对黑龙江地方史的研究与地方文献整理的过程中,民族的伟大与民族的苦难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在历史上,黑龙江饱受日寇与沙俄之害。日寇沦陷我东北十四年,强制推行了灭亡我民族的奴化教育,黑龙江一百余万平方公里土地被沙俄强行割占,大批华人惨遭沙俄匪徒杀害等罪行,都是有案可查、罄竹难书、铁证如山。基于此,我在对传统文化热爱的同时,对作为列强侵华产物、民族耻辱象征的殖民文化则是深恶痛绝。当然,如果两个国家在平等基础上互相交流而引进的异国文化,我们是欢迎的,因为它丰富了我国民族文化的内涵,为我国民族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而殖民文化却是列强以刺刀及武力为后盾强加给我们的不平等的文化,其实就是继军事侵略之后的一种文化侵略行为,也是对我国民族文化的践踏、摧残与侵犯。可见,对民族文化(包括传统文化)的热爱与对殖民文化的痛恶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是统一的,是相辅相成的。基于此,捍卫民族文化的尊严与抵御殖民文化的入侵,也就成为我刻苦钻研、事业有成与论著丰产的一种精神支柱,可见传统文化教育对我影响之巨大。

在这方面,本人未能出身书香门第,而且上中小学时家庭极为贫困,因此也未受过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而大量的传统文化知识都是以后在工作(尤其是科研工作)中逐渐积累的。我曾读过上千种古籍,从中领悟到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并为之倾倒膜拜,进而接受它的洗礼。

二、早年苦难与贫困逆境的磨砺

我的童年、少年,乃至青年的苦难(参见本《文集》自传部分)及长期贫困的生活,固然给我带来生活上与精神上的冲击,这种逆境也磨砺与锻炼了我,培养了我困不辱志、自强不息及发愤读书、刻苦钻研的奋斗精神。艰苦的条件、困厄忧患乃至贫贱的环境,固然使一部分人意志消沉、信心丧失、无所作为,但却使另一部分人受到磨砺与锻炼,增强斗志,奋发向上,有所作为。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宋代学者张载说:“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司马迁也谓:“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就是说承担大任之人,必须首先历尽艰苦困厄,贫贱忧

戚能够玉成于人,即艰苦困厄对一个人的成才可以起到玉成作用,而司马迁举出很多例证正证明了这一命题的正确性。可见艰苦、困厄、贫贱、忧患等逆境对造就人才所起的促进作用。本人童年丧母,父亲失业,流离失所,为抚养两个幼孩,艰苦备尝,父恩母爱兼备,垂三十年而后已。在一贫如洗、举步维艰之中,我曾于十五六岁时摆过地摊,夏天因屋小闷热,难以入睡而露宿过街头。大学毕业后,虽然有了工作与工资,但清贫依旧。至今虽然出版了大量论著,但稿费少得可怜,依然是身居陋室,簞食瓢饮,家中除了数千册图书外,没有其他一件值钱之物,仍可谓家徒四壁。这一境遇,使我在艰苦朴素、勤俭节约之中,产生了对贫贱者、弱势群体的无限同情以及“为不幸者存史的激情冲动”(来新夏先生语),我研究处于封建社会底层的农民的起义是这种激情的反映,研究从前在学术界备受冷遇的古代流人也是如此。另外,也激发了我为改变命运而与艰苦、困厄、忧患的逆境挑战的勇气、信心与力量。因此,每当我在治学中遇到困难与挫折时,想起过去的苦难、贫穷与坎坷,就会产生一种动力,就会精神振奋、勇气倍增、信心十足。这样,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

三、家庭与社会各界乃至广大读者的大力支持与关爱

本人的事业有成、论著丰产,更得益于家庭与社会各界,乃至广大读者的大力支持与关爱。

在家庭中,首先要感谢我的父母,其次是我的妻子。他们为我的事业有成,做出了无私的奉献,为了我的成功毁掉与牺牲了自己的幸福。母亲虽然于我八九岁时病逝,可是在我八九年的生命历程中,她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与恩重如山的母爱,虽然由于我当时过于幼小,大多已不记得,但记得她临咽气时,一手指着床前的我与小弟弟,又用满含泪水的双眼直望我俩的神情,那种难以割舍的痛苦及慈母的大爱,已经不言而喻。至今思之,泪如泉涌。

由于家贫,无力送医治疗,母亲于1946年阴历二月的一个春日,被贫困与疾病夺去了年仅二十九虚岁的生命,病故于家中。次日清晨,一位好心的邻居用马车载着她的遗体,我打着灵头幡送走了妈妈。之后,年仅三十五虚岁的父亲承担起既做父亲又做母亲的职责。当时父亲既要打工挣钱养家糊口,又要照顾两个幼孩,有时外出办事时,一手抱一个,一手领一个,我不知这段岁月他是怎样度过的?其处境的艰辛与内心的痛苦,我无法想象、不能想象,也不敢想象。至今偶然思及,心如刀

割,肝肠寸断,泪如雨下,悲痛欲绝。30年后,在我与小弟均已成家立业,并工作多年后,家父感到抚养子女的重任基本完成,可以告慰家母在天之灵了,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找了一个老伴,又经过八九年的生活,于1985年4月病逝,从而走完了其孤独、寂寞而又辛酸的一生。生前他老人家对我的期望甚殷,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我的身上,总是嘱咐我:“好孩子,好好读书,好好做人。”在处境奇窘,手头极其拮据的情况下,还经常节衣缩食地攒钱支持我买书,目前,我所收藏的数百册线装书及民国间旧平装书,都是家父给我买的。至今思之,辄潸然泪下。总之,在漫长的艰苦岁月中,恩重如山的父爱,培养支持了我酷爱读书的习惯、刻苦钻研以改变人生命运的信念,及与困难做斗争的勇气,从而为后来献身于学术研究事业且学有所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如果说我的事业有得益于父母恩重如山的大爱与无私的支持,更直接得益于四十七年同患难的妻子。她曾执教于小学、中学,被评为中学高级教师,忠于职守,恪守师德,教书育人30余载。于1968年与余结为伉俪后,在长期清贫中教书之暇,操持家务,抚育子女,助我事业有成,茹苦含辛,鞠躬尽瘁。我们婚后的十三年,与两个孩子租住在一间7平方米的阴暗小屋内,由于她持家有方,凭两个人的工资,全家人生计尚可勉强维持。她的字写得好,教书育人与经营家务外,经常帮我抄写、校对、整理稿件、改正措词不当之处,可称是我的一些作品的第一个读者。还常伴我夜读,更深不眠。1977年退休后,右眼患病,后来只能看见人影,另一只眼也视力大减,可是她仍然无怨无悔、全力以赴支持我的科研。她承担了全部家务,减除了我工作的后顾之忧,因此她于2015年4月突发脑出血而病逝后,我悲痛欲绝,产生了天塌下来的感觉。

“恩重如山思父母,情深似海忆亡妻”(我近作悼亡之诗),家父、家母与拙妻对我的恩情刻骨铭心,永世不忘。没有他们深厚的亲情(夫妻之爱情,实质也是亲情)与大爱,没有他们无怨无悔、无私地倾情奉献与大力支持,也就没有我的今天。

当然,我今天的事业有成,也离不开几位恩师的指点和奖掖。

在社会各界中,我首先要感谢几位前辈学者对我的大力提携与支持。其中谢国桢先生是支持与引领我从事流人研究的最关键学者。我与谢先生之通信始于1960年冬,至1982年先生仙逝,仅“文革”前期中断5年,现收藏先生书信30余封。我每次寄信,先生无论如何忙碌,都

要复信(其中有多封用毛笔书写者)。多次将我的文章或书稿向有关单位推荐,多次当面或写信嘱我,以后出书要写序言可事前告知。但是,后来由于先生早逝,我出版了那么多书,先生竟无从赐序,言之令我扼腕,感慨生哀。其次,我要感谢后来依次为我的三部代表作《东北流人史》《中国流人史》(初版)《中国流人史与流人文化论集》俯赐序言的罗继祖、钱仲联与来新夏三位先生。罗先生耿介绝俗,不轻易称许人,可是我多次谬蒙奖誉,如谓本人“治学诚恣弗欺,有异于今之所谓学者”“情殷桑梓,下笔如椽”,对本人所纂《东北流人史》与《黑龙江历代诗词选》二书认为“文坛更喜张吾军”等。在致北方文物杂志社编辑王德厚同志信中谓:“现在……没有一个肯埋头读书的人,自然越往下坡走,如李兴盛这样同志已不多了。”这类奖掖之言甚多,不具录,令我铭感终身。钱先生博学多识,著述等身,是饮誉海内外的国学大师,能对一个后学晚辈俯赐书评与书序,实令我喜出望外。尤其是对拙著《中国流人史》之评价谓:“斯则中国数千年自奴隶社会至封建社会一血泪斑斑之痛史也,亦数十年流人开发边裔之纪念碑也……此书出,中国流人之历史作用,得以大显于世,学术界一种新体系与学派之创建,亦得以奠基于是。此书诚为有功学苑、传世无疑之巨著也。”可称推崇备至,令拙著生辉。来先生是我国著名学者,奖掖与提携后进,不遗余力,令我深为感动。先生在为拙著《中国流人史与流人文化概论》所撰序言《流人学的脚步》中,大声疾呼开展流人学的研究。2008年,又将此序增订,在首届全国流人文化学术研讨会上做了宣讲,赢得全体与会学者的掌声。后来,《中国流人史》(增订版)及《东北流人文库》出版时,又均俯赐序言。在这些文章中,认为本人的流人问题研究,“实则寓构筑流人学框架之深意”,“用功之勤,投入之深,求之当世,实不多得”。而且“兴盛之于流人学之研究,有史、有论、有专门著述、有文献汇编,足称完成架构专学之规模”。近年来,我将流人史、流人文化的研究升华为流人学的研究,正是来先生这种激励与支持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来先生的这种支持,也就没有本人流人学的研究。此外,还有一事使我记忆犹新。1977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为将《中国流人史》(初版)申报国家图书奖而请来先生撰写推荐意见时,先生欣然允诺,并在推荐书中给予很高评价。但在评审会上,北京某位“大家”以该书并没有什么创新为理由而一票否决(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拙著正因颇具创新才日益引起广大专家与读者的认同与

关注)。当我将落选消息告知来先生,先生却安慰道:“一时一事得失,本无足在意,要在真才实学。鸿篇巨著(指《中国流人史》)允为学林所重,又何挂念于浮名?祈阁下能自纾情怀为望。”先生爱我之深,溢于言表,这种慰藉,其实也是一种呵护与鞭策。

为我赐序的前辈学者还有李学勤先生。1997年《中国流人史》(初版)申报国家图书奖时,李先生也为拙著写有评语,2002年《中国流人史》(增订版)出版时,李先生再次为该书赐序,也令我铭感终身。

此外,前辈学者对我帮助极大者,另有哈尔滨师范学院(今哈师大)历史系周齐先生。周先生不仅是历史学家,也是颇为著名的书法家。1960年与先生相识后,先生一直支持我的科研,还在与友人通信时谓:“兴盛是独学无偶。”推奖之隆,令我汗然,也使我深为感动。1978年又推荐我到黑龙江省社科院历史所工作,使我从中学调到科研单位,真正开启了我做一个史学家之路,怀念与感激,曷可胜言!

总之,在我数十年单枪匹马、孤军奋战、惨淡经营的科研工作中,除了父母、妻子外,上述六位前辈学者对我均有知遇之恩,对我的教诲、奖掖与提携,鼓励与鞭策着我在崎岖不平、荆棘丛生的莽莽原野上,充满信心,大步向前,鼓励与鞭策着我在巉岩峭壁、险象环生的科研征途上,去攀登一个又一个的高峰。

此外,本人还曾得到海内外社会各界(学术界、出版界、图书馆、报刊媒体、艺术界与政界等)许多专家学者,乃至许多读者的大力支持,详见本《文集》后所附《后记》鸣谢一文。

最后,本《文集》能得以出版,要感谢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张翔同志及黑龙江省社科院原党委书记艾书琴同志、历史所所长赵儒军同志之大力支持。同时,还要感谢2009年“中国书坛十大人物”、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大连书法家协会主席张本义先生为本书题写书名。

在这里,我对所有支持我的人(包括《后记》谈到的各位女士与先生),以及关爱我的许多读者,表示衷心的感谢、诚挚的敬意!我要对他们说一声:“谢谢!感恩!”

李学盛

2017年7月25日初稿

2017年9月18日国耻日改定

作者学术概况

40 余年来,本人专著、编著、任主编、第一主编及执行主编之各种类型(含黑龙江地方文献与流人文献整理)著述,已出版者 47 部,任副主编者 4 部,计 51 部,加上报纸、杂志已发表之论文三四十篇及各种类型文章百数十篇,总字数已远逾二千万字。其中,本人所写之各种文稿(含古籍整理之序跋题记及古诗歌注释),计 700 余万字。

1991 年被评为研究员、黑龙江省省级优秀专家、省劳动模范。

1992 年 10 月获国务院特殊津贴。

1992 年 12 月被国家人事部批准为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

2002 年 11 月被黑龙江省政府聘为黑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2007 年 3 月被黑龙江省社科院评为首届终身荣誉研究员。

2008 年 9 月被黑龙江省委宣传部授予“龙江文化建设终身成就奖”。

专著《东北流人史》曾获中国图书奖二等奖、黑龙江省优秀图书一等奖与省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专著《中国流人史》(初版本 110 万字)曾获黑龙江省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与省优秀图书一等奖。

主编之《黑龙江流寓文化与旅游文化丛书》再次获黑龙江省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1997 年 4 月赴香港珠海书院做流人文化学术报告。

2002 年 7 月赴大连白云书院做流人文化学术报告。

2010 年 11 月赴上海图书馆做流人文化学术报告。题目为《泪洒冰天 血沃塞土——谈中国历史上的流人、流人史与流人文化》,被优酷网录制成专题片播出,80 余分钟。

2012 年 12 月赴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做流人文化学术

报告。

2008年5月本人受聘单位黑龙江省文史研究馆在本人30余年流人问题研究基础上召开了首届全国流人文化学术研讨会。

2009年12月本人主编之《东北流人文库》被批准为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重大委托项目。

2012年被列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之《中国流人史》(增订版220万字)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2015年5月由本人主编之《黑龙江区域史抢救性保护研究》(6卷本)被批准为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

本人还参加了由中央电视台录制的《流放宁古塔》(上下集,各30余分钟)专题片的演播,并曾接受哈尔滨电视台“老伴”节目组30分钟的直播采访报道。另外,还参与黑龙江电视台《旧梦新编话流人》等专题片之采访。